

论隋末薛举政权之失败^{*}

——以《胡演墓志》、《贺拔亮墓志》为中心

段真子

新出石刻文献资料,不仅能够丰富传世史料,而且可以为历史的真实提供新的信息。《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汴州刺史胡使君墓志铭》(以下简称《胡演墓志》)和《大唐故上开府大将军历旭宕岷武渭和六州刺史判岷州总管检校兰州都督贺拔府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贺拔亮墓志》)^①的出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学术原理。在隋末群雄的割据竞争中,薛举父子是给李渊政权带来最初冲击的一股势力。薛举,隋金城校尉。大业十三年(617)四月癸未,自称西秦霸王,改元秦兴^②;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己酉,其子仁果投降唐朝,西秦政权结束^③。这个西秦政权虽然只存在了二十个月,但作为“隋末群雄”^④中的一支,却是研究隋末天下局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过以往针对薛氏及其政权的研究,所依据的史料都是传世文献,研究有所局限是难免的。所幸《胡演墓志》和《贺拔亮墓志》记载了志主对抗薛举、称款归唐的事迹,为相关史实提供了新的证明。作文讨论,且请方家指正。

^{*} 本论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14XNH035)。

①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6-78、86-87页。

②《隋书》卷四《炀帝本纪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92页。《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中华书局,1956年,第5724-5725页。

③《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8页。《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8页。《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第5821页。按,“仁果”,《通鉴》作“仁果”。

④有关此说法,可参见严耕望:《隋唐时期战史》第二节“唐平群雄”,《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52-1356页。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单元二“开国群雄传”之第二章《〈旧唐书〉“隋末群雄传”形成过程臆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0-116页。

一、两方墓志相关记载

关于两方墓志的形制、两位墓主的家世等基本情况,张雨《新出唐胡演墓志与初唐司法政务》以及李鸿宾《唐贺拔亮家族汉化取径之研究》^①已进行详细论述,在此无须赘言。下面先将两方墓志的相关内容摘录于下,以便对薛举政权失败原因展开讨论。《胡演墓志》文曰:

大业二年,擢授泾州鹑觚县令,俄迁京兆郡武功县令。地曰神畿,民多狡猾。公韦弦备举,威惠兼施。剥鼓之豪,怀德音而屏迹;探丸之俗,仰仁声而革面。转拜北地郡丞。属五岳尘昏,九瀛波扰。鹤鼎迁而瑶管变,龙图启而璇历新。去殷归周,箕子之深智;背楚从汉,陈平之远识。义宁初,率郡归国,授左光禄大夫,封归义县公,拜北地郡太守。于时国步未康,妖氛尚梗。公招怀安集,境宇清夷。属薛举称兵,王师问罪,粮饷斯重,转运为劳。公倾私廩以犒军,率轻赍而赴敌。朝廷嘉美,玺书廷劳。武德元年,除使持节宁州诸军事、宁州刺史,兼折威军将,追入为大理少卿。^②

隋朝之北地郡(今甘肃省宁县),地处关中,开皇年间曾为宁州、邠州,大业三年(607)隋炀帝改为北地郡,“统县六,户七万六千九十”^③,北接弘化郡,东临上郡、京兆郡,西有安定、扶风二郡。据墓志时间,胡演“率郡归国”发生于义宁后、武德元年前,对此,传世史书中惟有《资治通鉴》“(武德元年)八月,薛举遣其子仁果进围宁州,刺史胡演击却之”^④的叙述,能够提供更为精确的定时依据和胡演归款行为的佐证。

在纳入李渊政权势力范围之前,北地郡隶属隋朝,但实际上已经处在相当复杂的局势之中。仅就《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梁师都占据弘化,薛举迁都天水,而李渊政权也已渡过黄河,先后占领安定、冯翊、上郡、京兆等地^⑤。因此,北地郡所面临的形势,或是继续为隋朝坚守阵地,或是归附于某一政权,因为周边的这些势力都把北地郡当作扩张的目标。北地郡虽不具有长安城、河东郡那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其动向仍会对任何一方政权于关中地区的控制力产生影响。北地郡如果归附李渊,则与安定、京兆两郡形成贯通,从而基本阻隔了梁师都南下、薛举东进的线路;如果北地郡纳入薛举或梁师都的势力范围,就意

①张雨:《新出唐胡演墓志与初唐司法政务》,《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第157-173页。李鸿宾:《唐贺拔亮家族汉化取径之研究》,《唐研究》第十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5-480页。前者写作重点在于探讨唐朝司法政务运行,后者则着重讨论鲜卑族进入内地后文化认同等问题,对于胡演、贺拔亮二人归附李渊、对抗薛氏的事迹,两篇文章仅作为生平予以介绍,没有深入分析其行为对于李渊、薛举两政权的特别意义。

②《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汴州刺史胡使君墓志铭》,《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77页。

③《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第810页。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第5806页。

⑤《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第5718-5766页。

味着增添了这两个势力经由此地形成联合的可能,阻碍李渊政权对河西地区的全面控制,对李渊造成更重大的威胁。

最终,身为隋官的胡演选择归附李渊政权。这一举动不仅使李渊政权获利,更对薛举政权势力扩张造成严重影响。首先,墓志记载“属薛举称兵,王师问罪,粮饩斯重,转运为劳。公倾私廩以犒军,率轻赍而赴敌”,反映的是义宁元年(617)十二月“癸巳,世民击薛仁果于扶风,大破之,追奔至洮坻而还”^①一事。在这次薛、李对抗中,胡演及其北地郡实质上充当了李渊军队的后勤部,增添了李世民胜利的砝码。因为此时李渊政权虽然已经占领长安,拥有永丰仓,但长途运输军粮仍然困难。此时胡演倾其私廩以供军粮,并且率兵一同作战,大大减轻了李世民一方在人力、物力方面的压力,为其打破薛仁果,从而占领扶风郡提供了重大帮助。而对于薛举政权而言,扶风之战的失败极大地打击了薛举对其政权的自信心,在此之前无往不胜的战绩被打破。这次失败,甚至令薛举在逐鹿天下同时,作出了“自古天子有降事乎”^②的第二手准备。

其次,《资治通鉴》对宁州一战的记载,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胡演归附对李渊政权的重大意义。由于李渊政权先于薛举实现对长安的占领,薛氏政权向东扩张之路已经受阻,必须另外打通一片区域以寻求突破。事实上,薛举最初的计划是“与梁师都及突厥连兵以取长安”^③,但最终李渊与突厥的联合而未能实现,于是转而计划趁高塘一战的胜利,通过攻占宁州“乘胜直驱长安”^④。然而正是由于“刺史胡演击却之”,政权失去一鼓作气之势,再加上薛举关键时刻的去世,这一方的实力立刻出现了急转直下的态势。

如果说胡演率北地郡归附阻碍了薛举政权向东扩张,那么贺拔亮率临洮郡归附李渊政权,则又动摇了薛举政权后方的稳固。据《贺拔亮墓志》记录:

起家随左勋卫,寻诏朝散大夫,平西府鹰击郎将。逮随室土崩,方隅荡覆。公率所属,据洮阳城。羌贼攻围六月餘日,城无积粟,地绝通泉,公阴开隧道一百餘步,旁汲洮水,以救倒悬。薛举重聘连横,公乃斩其将命。举遣骁将刘龙,围公数月。公散家财,购士力战,追败龙军,只轮不反。因击破其伪镇,得其仓储官属。还保洮阳,乘兹益振。岂若臧洪智尽,方烹爱妾;耿恭虑屈,始拜穷泉。自此坚守三年,折冲万里,受命遄征,无思不服。初率洮、叠、旭、宕四州,间使诣唐称款。义宁二年,以公全保一方,勋光朝野,固守诚心,确乎不拔,乃授叠州通守。武德元年,迁旭州刺史;二年,宕州刺史;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第5766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第5767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第5787页。

④《新唐书》卷八六《薛举传》,第3706-3707页。

三年,岷州刺史;皆遥命也。^①

墓志中所提到的洮阳城,隋末属于临洮郡,而贺拔亮率领归附李渊政权的洮、叠、旭、宕四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大体范围为隋朝的临洮郡和宕昌郡^②,此二郡位于洮河、枹罕、陇西、天水等郡之西南,即薛举政权的后方。对于薛举政权而言,该地区的稳定与否,不仅影响东向扩张之势头,更是政权本身稳固之基础。

由史书记载可知,薛举势力起兵伊始便获得了临洮郡羌族势力的支持。《资治通鉴》提到,义宁元年四月薛举袭枹罕郡时“岷山羌酋利俗拥众二万归之,举兵大振”^③,在此之后,薛举“分兵略地,取西平、洮河二郡。未几,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④。可见,临洮羌酋势力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薛举的势力,更扩展了薛举的政权版图。但贺拔亮所据守的洮阳城并未被薛举征服,这便埋下日后动摇薛举政权后方的隐患。

《资治通鉴》所记载之岷山,据《隋书·地理志》称“临洮郡临洮县有岷山”^⑤。临洮县位于临洮郡东南部,而贺拔亮所据守之洮阳城,位于临洮郡西北部。墓志所言“羌贼攻围六月餘日”,具体时间无从得知,或为羌酋归附薛举政权之前进行的自我扩张,或为归附薛氏之后对后方的维稳行动,但无论如何都因贺拔亮的顽强抵抗而失败。正因如此,在薛举政权完成对枹罕、西平、洮河等郡的占领并迁都天水的过程中,始终未见对临洮郡的更多记载,这当与贺拔亮的坚守有关。另外,墓志中“击破其伪镇,得其仓储官属”、“折冲万里,受命遄征,无思不服”等记述,证明贺拔氏不仅有坚守,还有反攻。贺拔氏成为薛举后方的麻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贺拔亮及其临洮郡归附李渊政权的时间,《资治通鉴》记录在武德元年八月“丁酉,临洮等四郡来降”^⑥。可见,武德元年八月,薛仁果进攻宁州,遭到胡演抵抗,进攻长安再次失败。而几乎是同时,作为薛举政权后方的临洮、宕昌等地区也突然发难,归顺了李唐,这导致薛氏政权陷入腹背受敌之境,李渊完成了对薛氏势力的包围。

二、李渊策略与胡、贺投唐

胡演、贺拔亮二人墓志,作为对其一生的概括和彰显,必然将归附李渊的

①《大唐故上开府大将军历旭宕岷武渭和六州刺史判岷州总管检校兰州都督贺拔府君墓志铭并序》,《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87页。

②《旧唐书》卷四〇《地理三》,第1638-1639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第5725页。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第5725页。

⑤《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第820页。

⑥《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第5807页。

行为定义为明智的选择。那么,胡、贺二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选择归附李渊政权?从身份上看,胡演、贺拔亮并为隋朝官员,前者作为北地郡的地方官,后者则掌握着武装力量,都可以算得上地方实力派;从所处环境看,北地、临洮虽分属关中、河西地区,但薛举建立的西秦政权的强大势力已经或多或少渗透周围,大有顺势占领之意。虽然如此,李渊政权还是成为了其选择归附的对象,原因何在?从墓志所记载的时间来看,胡、贺二人对李渊政权的归附,并不是发生于李渊太原起兵伊始,说明他们的选择绝非单纯响应“李氏将兴”的谶语^①,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斟酌权衡的结果。那么,是什么吸引并影响他们做出决断的呢?

就河西地区而言,薛氏的西秦显然占有更大优势。薛举起兵百日便已“尽有陇西之地”^②,其强大的战斗力决定了它是逐鹿天下的一支劲旅;而李渊政权虽然起兵时间略晚,但却采取了一系列看似迂回而直击要害的策略,正是这些策略决定了李渊势力在击败西秦、逐鹿天下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并最终赢得胜利。

大业九年(613)杨玄感起兵,“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③的口号,使其起兵初就已完全站在隋朝的对立面上,由于目标过于明显,短短数月便被平定。杨玄感的最终失败成为李渊晋阳起兵的前车之鉴,他必须为起兵找到名正言顺的借口,一方面放松隋炀帝统治集团警惕,一方面要有利于争取到隋朝官员的支持。因此,李渊政权打起了“尊隋”的旗号,即“反皇帝而不反隋”。这一旗号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拉拢隋朝的各种官僚势力,减少阻力,尽快地夺取关中,以便站稳阵脚,最后建立唐王朝”^④。李渊于七月起兵之后,九月渡过黄河,进驻长春宫;十一月便攻克长安,扶持代王杨侑即位,改元义宁。李渊率先实现对长安的占领,对任何要逐鹿中原的势力的影响都是致命的。它不仅意味着李渊政权成功占领了永丰仓等重要战略物资储备^⑤,更为重要的是其占据首都以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意义。对此清代学者顾祖禹曾有言:“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

①有关“李氏当兴”之谶,可参李锦绣:《论“李氏将兴”——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一》,《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30-36页转第40页;杨梅:《也谈“李氏将兴”与“刘氏当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40-44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第5725页。

③《隋书》卷七〇《杨玄感传》,第1617页。

④许道勋、赵克尧:《论晋阳起兵——兼评李渊在唐王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晋阳学刊》1981年第4期,第110页。

⑤有关永丰仓及其他仓储对于隋末各割据政权之意义,前人已多有研究,例如,姜望来:《隋末粮仓与群雄盛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朝资料》,2003年,第85-96页,等等。

必强。”^①在隋唐时代的关陇集团统治之下,关中本位意识十分强烈,长安城因此拥有了压倒性的政治意义^②。在占领长安之前,虽然李渊身为皇亲,但与早已起兵的薛举及其他割据政权并无过多差别;然而通过进驻长安、扶持代王即位之举,李渊政权占据了合法性的制高点,这自然容易得到隋朝官员、地方实力派的重视。

隋朝大厦将倾,此时天下的统治权更多集中在隋朝官员(尤其是掌握兵权和地方行政权力的官员)手上,缓解与他们之间的矛盾,甚至争取他们的支持,不仅弱化了对抗,更有利于政权的转移。李渊显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除了“尊隋”等口号的宣传,更是通过颁布一系列与隋官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尽可能多的吸收地方实力派加入自己的阵营。在这些政策中,最关键的便是始终坚持任用归附者,承认他们原来的职务、品级和待遇,甚至以更高的待遇作为奖励。例如:

河池太守萧瑀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降,以窦璡为工部尚书、燕国公,萧瑀为礼部尚书、宋国公。^③

这种具体政策,对处在乱世之中的隋朝官员和地方势力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李唐因此不是真正的造反者,而是隋朝的继承者。于是,在李渊政权占领长安之后,大批隋旧官员、割据势力领袖转而对其表示支持和归附。胡演、贺拔亮的归附也是如此。在他们归附李唐的时候,并不会强调李唐的实际政策,而是强调李唐的正义,但他们内心深处,一定更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

三、薛举政权败因再分析

胡演、贺拔亮二人对李渊政权的归附,无意中造成薛举政权腹背受敌的局面,这是传统史料记载中未能呈现的历史细节。相比之下,史书记载更注重的是对薛氏残暴统治的捕捉。据《旧唐书》卷五五《薛举传》载:

举每破阵,所获士卒皆杀之,杀人多断舌、割鼻,或碓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挞其下,见人不胜痛而宛转于地,则埋其足,才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

仁果,举长子也,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为万人敌。然所至多杀人,纳其妻妾。获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猛火之上,渐割以啖军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窍,以求金宝。举每诫之曰:“汝智略纵横,足办我家事,而伤于苛虐,与物无恩,终当覆我宗社。”^④

①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五二《陕西方輿纪要序》,中华书局,2005年,第2449页。

②“关中本位政策”问题,陈寅恪先生所论甚多,可参考《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19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第5767页。

④《旧唐书》卷五五《薛举传》,第2247-2248页。参见《新唐书》卷八六《薛举传》,第3707页。

由此,史学家总结出薛举政权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即残暴统治导致的“失道寡助”。但两《唐书·薛举传》所记述之事虽大体上差别不多,在细节上却还是存在明显不同。在《旧唐书》中,暴虐之事的主人公当属薛举及其妻子;而《新唐书》则载于薛仁杲及其妻子名下。对此差异,《资治通鉴》并未给出明确辨误,也并未采取任选其一的简单方式,反而只是一笔带过,仅保留薛仁杲“尝获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火上,稍割以噉军士”以及“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责其金宝。举每弃之曰:‘汝之才略足以办事,然苛虐无恩,终当覆我国家’”^①两句记载。这就可以看出,司马光等人对两《唐书》中的记载并非十分确信。元代胡三省也于此处作注曰“史言薛仁杲在兵间不能收礼文艺名义之士,卒以败亡”^②,即认为薛氏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残暴统治,而是由于人才的缺失导致的实力不足。如果说不同史籍之间记载的出入与缺漏,只能看作史家的不同侧重点,那么散落于两《唐书》其他人物事迹中的蛛丝马迹,则无疑成为“薛氏残暴”观点的反例。据《旧唐书》卷五八《刘弘基传》记载:

(刘弘基)又从太宗讨薛举。时太宗以疾顿于高墪城,弘基、刘文静等与举接战于浅水原,王师不利,八总管咸败;唯弘基一军尽力苦斗,矢尽,为举所获。高祖嘉其临难不屈,赐其家粟帛甚厚。仁杲平,得归,复其官爵。^③

同书卷六九《薛万彻传附刘世让传》又载:

(刘世让)率兵以拒薛举,战败,世让及弟宝俱为举军所获。举将至城下,令给说城中曰:“大军五道已趣长安,宜开门早降。”世让伪许之,因告城中曰:“贼兵多少,极于此矣。宜善自固,以图安全。”举重其执节,竟不之害。太宗时屯兵高墪,世让潜遣宝逃归,言贼中虚实,高祖嘉之,赐其家帛千匹。及贼平,得归,授彭州刺史。^④

又,卷一八七《常达传》载:

武德初,拜(常达)陇州刺史。时薛举屡攻之,不能克,乃遣其将件士政以数百人伪降达。达不之测,厚加抚接。士政伺隙以其徒劫达,拥城中二千人而叛,牵达以见于举,达词色抗厉,不为之屈。举指其妻谓达曰:“识皇后否?”达曰:“正是瘦老姬,何足可识!”竟释之。有贼帅张贵谓达曰:“汝识我否?”答曰:“汝逃死奴。”瞋目视之,贵怒,拔刀将斫达,人救之,获免。^⑤

如果按照两《唐书·薛举传》中的描述,不论薛举抑或其子仁杲,对待战俘都应该采取酷刑,或虐或杀。而上述例子则刚好相反,面对刘弘基、刘世让两名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第5746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第5746页。

③《旧唐书》卷五八《刘弘基传》,第3310页。

④《旧唐书》卷六九《薛万彻传附刘世让传》,第2522页。

⑤《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常达传》,第4866—4867页。

李渊政权的将领被俘，薛氏非但没有夺其性命，甚至并未实施酷刑；面对常达如此“大不敬”的轻蔑之词，也还是进行了宽赦。暴虐与仁慈两种行为的并存，说明薛氏暴虐的说法真实性大可怀疑，或是后世为凸显李渊政权正当性而在史书编纂过程中追加的记载。因此，把暴虐当成薛举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以“暴虐”解释西秦覆灭的传世观点也需要纠正。

薛举的西秦政权作为“隋末群雄”中的一支，具备逐鹿天下的实力，与起兵之初便获得众多支持者从而势力迅速壮大密切相关。对于其部众的组成情况，陆庆夫先生归纳为五个部分^①：

1. 薛举任金城府校尉时所带的兵众三百人，以及郝瑗招募新兵数千人；
2. 薛举起兵时归附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宗罗睺部众；
3. 薛举和宗罗睺的兵力会合后所招“群盗”；
4. 攻打枹罕时羌酋鍾利俗二万羌众；
5. 被火并的洮源唐弼所统十万兵力。

正是由于这些支持者的加入，西秦政权于“数日间，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②，成为李渊于河西地区最强劲的一个竞争对手。然而，如此壮大的队伍内部却很快出现裂痕，并逐渐解散。对此，两《唐书·薛举传》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它们相较于暴虐的细节更值得关注和分析：

会义兵定关中，遂留攻扶风。太宗帅师讨败之，斩首数千级，追奔至陇坻而还。举又惧太宗逾陇追之，乃问其众曰：“古来天子有降事否？”伪黄门侍郎褚亮曰：“昔越帝赵侗卒归汉祖，蜀主刘禅亦仕晋朝，近代萧琮，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其卫尉卿郝瑗趋而进曰：“皇帝失问。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汉祖屡经败绩，蜀先主亟亡妻子，战之利害，何代无之，安得一战不捷，而为亡国之计也！”举亦悔之，答曰：“聊发此问，试君等耳。”乃厚赏瑗，引为谋主。^③

这段文字记载紧接于薛举即位、建元并且占据河西地区之后。可以看出，虽然政权建立之后已经取得一些胜利，势力也有所壮大，但随着李渊政权入驻长安，在关中立稳脚跟，薛举政权向东进一步扩张的计划遭遇阻碍，其在河西的地位也开始受到威胁。而扶风一战薛举大败，政权内部终于开始发生动摇，甚至连薛举本人对于李渊势力也心生恐惧，萌发投降的念头。薛举部下开始出现以褚亮、郝瑗为代表的两派，对“投降”或支持或反对。政权内部的动摇，正是源于对自身政权实力的怀疑以及对李渊政权强大政治攻势的恐惧。

薛举集团并未向李渊投降，郝瑗还因此成为政权的“谋主”，但政权内部的分歧和裂痕并未终结。随着李渊政权不断壮大，胡演、贺拔亮等地方实力派纷纷

^①陆庆夫：《薛举起兵考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第95-96页。

^②《旧唐书》卷五五《薛举传》，第2246页。

^③《旧唐书》卷五五《薛举传》，第2246-2247页。关于这次是否投降的讨论，《新唐书》卷八六《薛举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均有记载，文字略有不同。

投奔,薛举一方的优势明显减弱,加上薛仁杲执政之后“与诸将素有隙者,咸猜惧”^①的变化,政权内部的动摇和倒戈越发明显,并最终导致政权的失败和覆灭。

最终,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己酉,薛仁杲投降于李世民。这次失败并不单纯由于军事方面的失误或劣势,西秦政权内部的解体也是重要因素。据史书记载,在薛举政权覆灭前的最后一战前,其主要成员出现了集中的外逃。为了更清晰地分析薛举政权内部情况,现将薛举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的最后去向列表如下^②:

姓名	任职或称谓	最终去向
宗罗睺	义兴王,“贼帅”	战败后归附 ^③
张贵	“奴贼帅”	战败后腰斩 ^④
常仲兴	将	未知 ^⑤
忤士政	将领	战败后腰斩 ^⑥
翟长孙	内史令,“贼帅”	浅水原战前投降 ^⑦
牟君才	将	浅水原战前投降 ^⑧
梁胡郎	将	浅水原战前投降 ^⑨
锺俱仇	左仆射	浅水原战前投降 ^⑩
锺利俗	羌首	未知 ^⑪
奚道宣	柱国	战败后投李轨,后反 ^⑫
旁企地	羌豪	战败后投降,后反被他人杀 ^⑬
浑干	骁将	浅水原临阵投降 ^⑭
郝瑗	卫尉卿,谋主	薛仁杲即位后“病不起” ^⑮
褚亮	黄门侍郎	战败后归附 ^⑯

①⑦⑩⑮《旧唐书》卷五五《薛举传附子仁杲传》,第2248页。

②本表前两列参考陆庆夫:《薛举起兵考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第96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第5822页。

④⑥《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第5823页。

⑤《旧唐书》卷五五《薛举传》,第2246页。

⑧⑨《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第23页。

⑪《旧唐书》卷五五《薛举传》,第2246页。

⑫《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第2251-2252页。

⑬《旧唐书》卷一九三《列女传·卫衡妻王氏传》,第5140页。

⑭《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第5821页。

⑯《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第2581页。

薛举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除少数隋旧官员(郝瑗、褚亮)外,多为早已起义的小部势力、部落领袖。薛举起兵前身为金城府校尉,本身带领一支队伍,起兵初期已经具备一定军事实力,所以活动于附近地区的小股势力极易附势旗下。但随着李渊政权日益壮大,特别是占领长安,稳固关中之后,这一部分成员便开始动摇,产生了投降李渊以求“转祸为福”的想法,褚亮便是其中的代表。通过上表归纳可知,浑干、翟长孙、牟君才、梁胡郎等人,都是薛举起兵伊始便追随左右的将领,大战之前却相继投降于李渊政权,甚至连“谋主”郝瑗也因为悲痛薛举之卒而一病不起,主要成员的离走,基本决定了最终结局。

“隋末沸腾,被于宇县,所争天下者不过十数人,馀皆保邑全身,思归有道”^⑩,贞观朝臣张玄素之言,概括了隋末动荡时期地方势力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对此,清代王夫之也有议论:“至大业十二年,而后林士弘始称帝于江南,竇建德、李密踵之,自命为王公,署官僚,置守令,虽胥盗也,民且依之以延喘息。”^⑪可见,面对隋朝苟延残喘、新兴割据政权林立的混乱局面,保全自身的最佳办法便是静观其变,在众多政权中择木而栖,这种选择往往通过其政治代表(当时对所在区域进行掌控的人或势力)对某一个政权的归附得以实现。本文所讨论的胡演、贺拔亮便是其例。他们虽身为隋官,也是一方水土的管理者和政治代表,对他们而言,有前途的政权是最安全的,有切身保障的政权是最有希望的,而这就是他们的选择。对于薛举、李渊这样的逐鹿者而言,吸收的民众、势力越多,意味着人力的补充、疆域的扩大,也意味着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者从而获得最终的胜利。

逐鹿中原,本是政治家之间进行的一场游戏,在这样的政治游戏中,民众的参与程度和影响显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胡演、贺拔亮等地方实力派,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地方利益和地方民众,这不是个能够一言以蔽之的问题。但是,有实力争夺天下的政权,显然是地方、社会或者民众选择支持的对象;而考虑社会或者民众以及有影响力的地方实力派的利益,从而获得更广泛支持的政权,才能最终在游戏中获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⑩《旧唐书》卷七五《张玄素传》,第2639页。

^⑪(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九《炀帝》,中华书局,1975年,第562页。